

不容忽视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

近年来层出不穷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愈演愈烈。正值国际食品和农业论坛在上海举行之际，当地媒体又爆出了广东佛山的一家食品公司自去年12月至今年3月，使用760吨容易致病的工业盐代替食用盐，用于生产酱油成品和半成品，并且已经流通到全国各地的惊人消息，即是明证。

自从2005年中国食品工业界把对人体有高度危害的人造化学染色剂“苏丹红一号”用于食品加工用途，引起中国政府的关注，在全国范围展开声势浩大的查禁行动以来，类似的大规模打击行动几乎是无年不有，如2008年的中国奶制品三聚氰胺污染事件、2011年的双汇瘦肉精养猪事件等等。从这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件，能够迅速得以揭发从而引起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以及有关当局的打击强度，不难看出中国民众是有相当强烈的食品安全意识，而中国各级政府也并非无所作为，然而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却屡禁不止，可见此一痼疾必有其赖以滋生和蔓延的社会土壤。

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尽管五花八门，花样百出，但归根结底，不外乎两大类：一是与谷物、蔬菜、茶叶、食用牲畜如牛羊猪鸡等原产品有关的食品安全问题，如农民过量使用农药或违禁农药，畜牧业使用能加速牲畜成长的违禁饲料或催生剂，最近日益引起关注的“毒茶叶”就是一例；二是食品工业界在把原产品加工成各种半成品或成品的过程中，产生的食品安全问题，上面提到的工业盐水制作酱油事件就是典型例子。而中国之所以一再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固然有不良奸商为了牟利而无所不用其极的因素，也有不得已的原因。

谷物、蔬菜等含有残余农药是一个受到高度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近年来要求提供无污染的天然农产品的呼声也日益响亮。可是，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可耕地却只占全球的7%，这个先天不足的制约因素，使得中国农业不可能采取无农药、无化肥的天然有机耕作方式，因为这样必定会导致

社论

2012年6月15日

谷物供应量的剧降，根本无法满足13亿中国人的基本粮食需求。此外，天然或有机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偏高，不管是土产的或者进口的，也只有那些具备高消费能力的少数中国人才能消费得起，不可能惠及收入普遍不高的

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各类加工食品，例如从奶牛到乳制品一条龙品质监控的雀巢优质产品，就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能消费得起的。

由于大多数中国食品消费者不具备高消费能力，食品生产商为了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只能采取低成本的生产方式。在越来越激烈甚至残酷的竞争环境下，食品业者为了生存，必然会想方设法地降低生产成本，其中的一部分从业者，难免就会把价格偏低的工业原料用于食品生产。

食品消费者本身的不正确消费意识，也是促成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个因素。现代的食品消费者，十分重视各种加工食品的口感、味道和色彩等，食品生产商为了吸引顾客，自然要把加工食品，如薯

片，制作得更脆、更美味、更鲜艳，不免也会在生产过程中采取一些非正常手段。以去年闹得满城风雨的台湾食品工业塑化剂事件为例，业者采取塑化剂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添加塑化剂的食品成品有一种独特的口感。

此外，鉴于中国也是出口大国，其食品安全问题所影响的就不仅仅是中国消费者，还包括外国消费者的健康，几年前的“三鹿奶粉”事件，就引起了国际性的恐慌，导致30多个国家和地区禁止进口或召回中国产奶制品。换言之，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并不仅是国内问题，也是国际问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从中国的社会现实情况看，要杜绝食品安全问题是不大可能的，但只要中国各级政府能持续打击不良业者，媒体不断加强监督力度，消费者也能提高食品安全意识，应能把这个日益严峻的问题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之不至于愈演愈烈。

在全球化步伐加快之际，不是所有经济体都已做好准备日益明显。国际竞争、技能过时和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是发达国家中工作人口面对的越来越严峻挑战。此外，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间的技能和收入差距也在扩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他的畅销书《全球化及其它的不满》（Globalisation and Its Discontent）里便描述了这些现象。最近，一些欧洲经济体，包括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也受挫，因为国际竞争力的大幅度下滑，这些国家的人民正面对非常困难的时期。

新加坡是个小和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对国际竞争更是敏感和容易受冲击。因此，维持国际竞争优势是新加坡必须接受和遵守的游戏规则。提高生产力是提升新加坡劳动人口福利的关键。私人企业界，尤其是中小企业，必须发挥带头作用；政府则必须时刻留意整个过程，扮演灵敏和公平的指导员角色。

新加坡肯定还不是个超级有效率的经济体，还有很多可以提高生产力的空间。根据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Asia Competitiveness Institute）的估计，同美国相比，新加坡主要行业过去10年的平均劳动生产力水平低于了约60%。比如，建筑业（低于30%）、资讯通信（低于40%）及酒店和餐馆（低于50%）的生产力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即使是较有竞争力的行业如金融服务（低于60%）、运输与库存（低于80%）及批发与零售（低于70%），平均生产力水平虽然比全国平均高，但还是比美国的同业来得低。

因此，说新加坡人的生产力还

热点话题 陈企业 陈光炎

全球化、国际竞争和包容性增长的现实

有他们的工资不能进一步提高是不正确的。当然，一名巴士车长不能同时驾驶两辆巴士，但在广大的服务业领域，更不用说建筑和海事业，我们明显的雇用了更多的员工来制造同样的产出。不只是数据，任何出国旅游、到餐馆、酒店及商店的人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说没有空间提升生产力或空间有限根本不是错误的。

在维护他提出的“第二次工资重组”极端建议时——现在普遍称为“第二次休克疗法”——林崇椰教授表示1979—1981年重组新加坡经济时的首个高工资政策是成功的。一些分析师则指出，高工资的政策可能是造成1985年经济衰退的一个原因——把工资提高到高于生产力并因此让我们丧失国际竞争力。我们做了一些实际的分析，发现工资高于生产力的确是造成我们那时丧失国际竞争力的一个原因，但汇率强劲、1984年的全球电子业周期性衰退及区域经济放缓，也是造成1985年经济严重衰退的因素。生产力在维持竞争力上是非常重要的，却不能完全解释我们今天面对的收入差距日益加剧的问题。

当新加坡面对来自亚细安邻国的越来越强大区域竞争，并在技能上进一步提升时，在50和60年代出生的新加坡人所拥有的技能，很快的便不能胜任更高增值的工作。尝试提高生产力的努力不能带来赶上快速经济重组需求的成果。来自低收入家庭，只有中学或更低学历的新加坡人，很快地陷入了难以翻身

的底层阶级。家庭成员多、社会困境和网络信息的劣势等因素，让他们们的处境更加不利。经济学家有责任探讨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全球化技术导向的技能落伍”理论可能不能提供完整的解释。

提高生产力、确保其竞争力环境及为中小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环境：

根据新加坡统计局的数据，中小企业占新加坡16万家企业的99%，雇用60%的劳动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超过50%。因此，它们有许多有待发掘的潜能，是对失业的重要缓冲，也是重要的社会稳定器，尤其是在面对出口冲击的时候。然而，多年来的残酷和公开竞争及市场力量，造成了生产力长期的低落及其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要确保中小企业蓬勃发展，我们必须注意单位营业成本的其他部分如土地成本、租金及收费。一旦这些成本被视为是必然的，要维持利润就不可避免的会挤压工资。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无疑会逐渐减少，裕廊集团目前局限于制造业活动的土地分配与工业地主角色，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来满足服务业中小企业的需要。

政府机构的全面努力，例如标新局帮助中小企业加强管理、人力资本新加坡（Human Capital Singapore）提升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和技师的领导能力、国际企业发展局协助建立更好的国际网

络、市场营销和品牌技术、经济发展局重新致力充当中间人，帮助中小企业和跨国公司联手在其他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的峇淡岛和民丹岛投资，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努力可以为新加坡人创造就业，提高中小企业的生产力和所支付的工资。对达到2009年经济战略委员会（Economic Strategies Committee）的目标也是向前迈进一大步。

劳资政三方关系和包容性增长的社会契约：

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的领导

公平分配生产力增长是社会契约的重要部分，政府不应该把这交给不确定的市场力量。更重要的是雇主必须让低收入工人公平分享生产力增长。政府的包容性增长计划，是为了确保雇主能够提高生产力并给低收入工人大幅度加薪——基本工资而不只是花红。这是全国工资理事会劳资政三方关系精神的一个例子。除了全国生产力与延续教育理事会（National Productivity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ncil）致力提高技能和公司整体生产力以便工人可以分得更多的努力外，我们也很高兴看到政府通过特别转移如就业息补助计划来帮助低收入者。这是一项鼓励就业的计划，不是像失业救济金那样的福利。

我们上个月在马德里就失业和竞争危机发表演讲时提出了全国工资理事会的概念，出席者的即时反应是这需要强大或家长式领导人才

能实行。我们则指出，需要的其实是实事求是的领导。

对企业来说，工资—生产力—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微观经济学的标准假设。有很多具体证据都显示了它实际的重要性，这些在世界上许多被研究的经济体都可以看到。德国经济持续的竞争力及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竞争力自2000年便大幅度下降，这对新加坡有重大启示。从2000—2010年，德国的工资大致是紧跟生产力，只超过生产力的5%。至于其他四个国家，它们在同时期的工资却超过生产力增长的约25—30%。德国经济的持续活力和竞争力和今天陷入困境的其他四个国家，正好提醒我们让工资增长超越生产力增长的危险。

提升新加坡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融入全球贸易和金融来维持发达国家生活水平：

致力加强新加坡的国际竞争力和融入全球化进程，是维持新加坡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唯一途径。未来，“新加坡公司”（Singapore Inc）将更依赖外来需求，和技术不断更新及结合本地和外来熟练工人的劳动队伍。较慢的增长肯定不是缓和社会压力的方法。相反，我们必须以谋取最大增长的策略向前看，在外来环境良好的时候为国家争取收入，在面对外来冲击时利用盈余缓和失业和收入差距所带来的痛苦。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环境中制造财富的过程中，在经济和社

会间平衡得失是无可避免的。一个有勇气的政府应该面对挑战，解释必要但往往不受欢迎的政策选择。

经济重组和提升生产力是个自我更新的永不间断过程，不只是对经济危机的反应或一次过的措施。即使经济维持稳定的增长，我们也应该有个持续和周期性的经济检讨委员会。在一个日益全球化和竞争激烈的世界，没有所谓已经完成或自动驾驶的经济重组和提高生产力的努力。

因此，我们建议在全国生产力与延续教育理事会内，成立一个独立和高层、一年两度的全国工资—生产力—竞争力工作小组。小组成员代表不同的利益，任务范围如下：

- 评估低收入新加坡人的社会概况和面对的限制，和新出现的永难翻身的底层阶级。
- 更好地了解特定行业的人力问题、商家的困难、及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期望。
- 向公众解释和教育他们提高生产力、国际劳动力市场竞争和更好的工作纪律的迫切性。

幸好，和许多欧洲经济体不同，新加坡不需要工资落后于生产力增长。事实上，长期以来，实质工资和生产力并驾齐驱。当然，短期来看，从一年到下一年，实质工资和生产力之间可以出现很多因素——特别是消费物价通胀和产品价格上涨间的差距。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牢记，没有生产力增长，工资和利润将是零和游戏。有生产力增长，它就会变成正和游戏。

两名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联合所长。叶琦译。

国家应当在何时采取军事干预行动以制止在其他国家境内发生的暴行？这是一个古老且出现在世界许多地方的问题。如今，这问题来到了叙利亚。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1904年表示：“有一些偶尔发生的罪行，因为规模极其且极端恐怖”以致我们必须动用武力干涉。在一个世纪前的1821年，当欧美双方正辩论是否干涉希腊独立运动，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就警告自己的同胞不要“远赴国外消灭恶人”。

更近的例子有1994年导致80万人死亡的卢旺达大屠杀，及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地区波斯尼亚男性和男童遭屠杀的事件。当时，许多人都誓言不会再让这类惨剧重演。但当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于1999年在科索沃发动大规模种族清洗时，联合国安理会虽然通过了一项决议将事件列为人道主义灾难，却由于俄罗斯否决的威胁而无法在第二项干涉行动的决议上达成共识。结果，北约国家对塞尔维亚进行轰炸，许多观察家认为这是“合理但不合法”的行为。

后来，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负责提出符合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款并同时维护成员国内部司法权的人道主义干涉建议。委员会认为各国都有保护其公民的责任，其他国家也应该以和平方式协助实现这一目标，但如果某国无视这一责任并屠杀自身公民，国际社会就应当考虑武装干预。

所谓“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的理念在2005年的联合国世界峰会上一致通过，但接着发生的事件却显示各国对它的理解不完全相同。比如，俄罗斯就一直宣称，只有安理会决议——而非联合国大会决议——才具有国际法约束力。与此同时，俄罗斯还否决了安理会对叙利亚的决议。讽刺的是，安南过后还被请了回来，参与了一个旨在制止在叙利亚发生的暴行，但到目前为止却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成果的行动。

直到去年，许多观察家都仅将这种“保护责任”视为一个无法实现的希望或者是一个崇高理想的失败。但在2011年，当利比亚前总统卡扎菲上校正准备

方向盘 约瑟夫·奈

干预行动的两难



特约漫画 王锦松

把在班加西的反对方斩尽杀绝时，联合国安理会在“保护责任”的基础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授权北约对利比亚使用武力。在美国，总统奥巴马采取谨慎的态度，等待阿拉伯联盟和安理会的决议出台，以避免小布什政府于2003年干预伊拉克的行为对美国软实力所造成的损害。但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则认为北约不仅是为了保护利比亚人民，而是想借决议推动政权更替。

事实上，相对于国际法的执行，“保护责任”涉及的更多时候是政治合法性和软实力上的斗争。一些

西方律师认为它包括了根据各国国际人道主义公约框架，对抗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和战争罪行的责任。但俄罗斯、中国及其他国家则不愿意为像在利比亚的行动提供一个法律或政治基础。

“保护责任”之所以无法在叙利亚实行还有其他原因。源自于传统的“正义战争”理论，“保护责任”不仅构建于一个良好的意愿，还需要一个合理的成功预期。许多观察家强调，利比亚和叙利亚两国在地缘位置和军事上的差异，将使叙利亚禁飞区和行驶禁航区的设立困难重重。而那些反对总统阿萨德的叙

利亚人也担心，2005年在巴格达发生的情况会在自己身上重演，一场教派之间的内战会比一个独裁者更加可怕。

这些问题显示了人道主义干涉的一些更大问题。比如，各种动机往往混合在一起（毕竟，当年罗斯福指的是古巴）。此外，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而且对如何推动社会工程及建立国家所知甚少。当我们无法确定如何改善这个世界的时候，谨慎就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美德，傲慢自大的愿望可以带来巨大的风险。跟吃药一样，外交政策必须在一些原则的指导下进行——“首先是不能伤害病人。”

但谨慎并不意味着在叙利亚问题上无计可施。其他国家政府可以继续尝试说服俄罗斯，让它相信推翻当前政权要比让阿萨德的反对者进一步激化对俄罗斯更有力。更强有力的制裁可以继续让这个政权丧失合法性，还可以说服土耳其对这个邻国采取更强硬手段。

此外，谨慎并不意味着人道主义干涉往往会失败。在一些事件中，即便存在各种动机，干涉却是有望取得成功的，而解除人们痛苦的代价也不是很高。对塞拉利昂、利比里亚、东帝汶和波斯尼亚的军事干预并未解决所有问题，但却的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其他干涉行动——比如在索马里——却没有取得这样的效果。

最近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大规模干预，虽然主要不是基于人道主义原因，却削弱了公众对军事行动的支持。为此我们应该牢记马克·吐温对他的猫的记录：在不小心坐在热炉子上后，它永远不会干同样的事，但同时也对一个冷的炉子敬而远之。

干涉行动会继续存在，虽然时间大概会更短、牵涉的部队规模更小并会依赖在远距离展开行动的技术。在这个网络战和无人驾驶飞机战争的时代，“保护责任”或者人道主义干涉不会那么容易走向终结。

作者 Joseph S. Nye 是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现任哈佛大学教授。
英文原稿：The Intervention Dilemma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2.